

·批校题跋·

郑杰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考述*

张秀玉

内容摘要:清代文献学家郑杰批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逾三百条,八千多字,为未完之作。注文涉及韩愈古文的音义、地名、人物、背景的考证辨讹;对韩文结构、风格、意旨、作法的揭示;后人对韩文的引用、注解和继承;记载了所见韩愈文集的版本,是历代注韩之作中较有特点的一部。

关键词:郑杰 批注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

郑杰,福建侯官人,清乾隆时期贡生,毕生从事典籍收藏、校勘、辑佚、刻印,是极有成就的藏书家和刻书家。郑杰好韩愈诗文,致力于批点校注韩集,并自号注韩居士,然而历时五年尚未能完成。清末藏书家叶昌炽称:“杰自弱冠为诸生,即潜心稽古……好读韩诗,欲合闽人方崧卿、魏仲举、廖莹中诸家,广为辑注,因注《昌黎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逸文、附录二卷,凡五易寒燠尚未脱稿,题其书室曰注韩居,自号注韩居士。”^①郑杰注韩之事,在各种著作记载中均称尚未完成,然而未成之稿不知下落。如《福建藏书楼》载“他前后共花了五年时间注《昌黎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和《遗文附录》二卷(未脱稿)”^②。对未完成之注韩稿未交待下落,显然是淹没在历史长河了。

1986年,当代收藏家章伯钧的遗眷李健生将夫妻二人的藏书整体捐献给安徽省图书馆。在这批藏书中有的一部《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集传》一卷。这部韩集正是郑杰批注并题跋的本子,书中有郑杰批注逾三百条,八千多字,对韩愈文章音义和结构、风格多有揭示,是诸注韩之作中很有特色的一部注本。

* 本文系2014年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桐城派士人游幕研究”(AHSKY2014D114)阶段性成果。

①叶昌炽著:《藏书纪事诗附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41页。

②尤小平:《福建藏书楼》,海峡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一、版本概况

此本框高 19.3 厘米,宽 12.5 厘米,半叶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同,四周双边,细黑口,双顺黑鱼尾。书前有宋王伯大《晦庵先生朱文公韩文考异序》及识语两篇。郑杰在书末题跋曰:“乾隆庚子,朱笥河先生督学闽中,曾借观过,定为宋槧,迄今已十年矣。书归于余,犹未甚剥蚀□蠹,而笥河师已早不存,悲夫!庚戌□□□二日杰识。”乾隆庚子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朱笥河即朱筠,于乾隆四十四年提督福建学政,乾隆四十六年返京后去世。由此跋文可知,郑杰于乾隆五十五年题跋,应当也是他批注此书的期间。书中钤有“郑氏注韩居珍藏记”、“郑杰之印”、“昌英珍秘”、“一名人杰字昌英”、“珍藏宝玩”、“牧斋”、“静观自得”、“小子芬”、“吴兴姚韩”等印记,见于书首、尾及各卷卷端。

韩愈文集在南宋孝宗时有方崧卿编《昌黎先生文集》,方崧卿另撰《韩文举正》十卷、《外集举正》十卷单行。南宋庆元三年(1197),朱熹以方崧卿的《举正》为据,另加考辨,撰成《韩文考异》十卷,成为最精善之本。《考异》只列所考字句,以小字注解。宝庆三年(1227)王伯大又据朱熹之本重编并作音释。此四十卷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即为王伯大重编本。《四库全书总目》云:“伯大以朱子《韩文考异》于本集之外别为卷帙,不便寻览,乃重为编次。离析考异之文,散入本集各句之下,刻于南剑州。又采洪兴祖年谱辩证、樊汝霖年谱注、孙汝厅解、韩醇解、祝充解为之音释,附于各篇之末。厥后麻沙书坊以注释缀于篇末,仍不便检阅,亦取而散诸各句之下。”^①此本方崧卿、樊汝霖、洪兴祖之注解均散于正文各句之后,并非附于篇末,则其并非王氏重编之式,而是又经所谓“麻沙书坊”改编者。

郑杰跋称朱筠曾将此书定为宋刻本。然书中并不避宋讳,玄、朗、敬诸字不避,比比皆是。与现存几种宋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比对来看,也并无与此书同版者。此书行款与元至正刻本相同,字体风格亦极似,然而经对比为不同版本。安徽省图书馆定为明初刻本,与现存的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比对又非同版。以字体及纸张来看,则为典型的麻沙书坊特征,因此定为元末明初间建阳地区刻本应无大差。

二、郑杰批注考述

郑杰批注涉及音韵训诂,文章体例章法,修辞、风格,以及考证文中地名、人物及事件背景等多方面。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对字词的注音训释。此书原刊音释为王伯大所作。王伯大为福州人,南宋嘉定七年(1214)进士。书中有王伯大识文说明编定缘由:“郡斋近刊《朱文公校定昌黎集》,附以考异,而音辩则旧所刊也。初读者未免求之音辩,质诸

^①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288页。

校本,既字不尽同,且音讹事多缺。此书有集注,有补注,有辩证,有全解,音通句释,引物连类,虽若加详,而于本文间亦抵牾,余颇病之。今悉从校本更定音训。”在王伯大音训之外,郑杰又另加音注约30字,以反切法为主。如《河中府连理木颂》注有:“嘉,居何切。阶,坚奚切。事,上止切。”郑注音释偶有讹误,如《汴州东西水门记》“然其襟抱亏疏,风气宣泄”句上注:“疏,疑作蹠,立跌切。”郑杰疑“疏”字当为“蹠”。实则韩文此处“亏疏”不误,同时期柳宗元《又祭崔简文》中亦用此词:“硕鼠大蚁,傍穿侧出,亏疏脆薄,久乃自窒。”^①而“蹠”字为当盖切,音带,意为环绕。卷之十四《郢州溪堂诗》“万目睽睽”句上注:“睽,音魁,目少睛也。”“睽”字训释亦误。《康熙字典》注睽字云:“《玉篇》目少精也。《六书故》反目也,因之为睽乖……又张目貌。《韩愈·郢州溪堂诗》万目睽睽。”郑杰以“睽”为“目少睛也”,显误,当为“张目貌”。

第二,郑注有大量对地名、人名、背景的注释和考证辨讹。这类颇见功力的对原文背景的注解有助于文意的解读。如《守戒》方崧卿注文对内容有注释:“今之通都大邑,介于屈强之间,而不知为之备。噫!亦惑矣!”郑注曰:“指蔡在成德、淄青间。”成德、淄青为唐时藩镇,蔡州为淮西道治所在。郑注指明蔡州处强藩之间。《释言》在“同迁于南者凡三人”句旁注“张署、李方叔”,注出与韩愈同贬南方的另外二人。韩愈与张署、李方叔同谪南方,见韩愈《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文载:“君方质有气,形貌魁硕,长于文词,以进士举博学宏词,为校书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监察御史。为幸臣所谗,与同辈韩愈、李方叔三人俱为县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平淮西碑》“传三姓四将”句上注“三姓李忠臣、陈奇、吴少诚。四将忠臣、希烈、少诚、少阳”,“凡兹廷臣,汝择自从”句上注“廷臣马摠、韩愈”,“文通加散骑常侍”句注“守谦以中官,不册勋”,皆将文中人物姓名注出。

注释中的校勘辨讹多涉及姓名、用字、时间等,皆辨之有据。《张中丞传后叙》“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雷万春”以红框之,天头批改为“南霁云”。韩愈文中有言,此文为李翰《张巡传》作补,以李翰传文中“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而作。然此文所补记为张巡、许远及南霁云事迹,并有张巡养子于嵩之事,并未记述雷万春事迹。此处显然应是南霁云,各种版本皆为“雷万春”,当为韩愈行文之误。

第三,郑注对韩文结构的分析。郑杰对结构的批注涉及古代文章结构理论的多个方面,一是伏笔论,即在前文中设下引子,以便后文发挥。如《师说》批注云“贵贱、少长、圣人,伏下三段种子”。《送郑尚书序》文中于“岁时必遣贺问,致水土物”、“故常薄其征入”、“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句旁批“伏讽”,于“家属百人,无数亩之宅,僦屋以居,可谓贵而能贫,为仁者不富之效也”句处批“善讽”。二是波澜说。文章中多设转折变化以使文

^①柳宗元:《柳宗元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48页。

章曲折生动。如《讳辩》中“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各句之上皆批“波澜”。三是文章层次之论。如将《送孟东野序》一文分为六层，在文中各对应处注出层次。四是疏密之论。《太学生何蕃传》“正色叱之，六馆之士不从”句上注“接得密，设下川泽卵石”。《南海神庙碑》“始公之至，尽除他名之税，罢衣食于官之可去者”句注“前段密，此段正欲疏”。五是主客之说。如《新修滕王阁记》“愈少时则闻江南多临观之美”句旁注“客”，“而滕王阁独为第一”句旁注“主”。六是纲领说，为文章点明纲领。如《南海神庙碑》“服公正直方严”句旁注“纲领”。郑杰之批注体现出对这些批评体系和术语的娴熟，因此往往一文之批点体现出多个方面。《送齐暉下第序》一文的批注有“双提”“单接”“应举去”“应娇激”“又探本而论”“伏必世案”“伏不惑案”“应渐”“应本”“大雅”等，文末注“突住”。另外，郑注常概括文章段落内容，以助明晰结构变化。《祭十二郎文》各处分别注有“序幼孤苦”“序壮时聚散”“序早衰倒跌”“忽插入信梦一段，陡作波澜”“翻上倒跌”“猛转入悲酸”“问疾，问日月，转杂转妙”“了亡者情事”“总结”“了生者情事”，将文章内容和结构转承悉数概括指明。

第四，对韩文风格、意旨、作法的评注。郑杰对韩愈文章风格之论自出机杼。对韩文尚奇、辩肆、生晦、简古、圆畅等多样性特征，有深入揭示。《试大理评事胡君墓铭》注“体奇”。《汴州东西水门记》“越三月辛巳朔，水门成”句上批“意平，体不得不奇”。《上张仆射书》注“三段圆而畅”。《与孟尚书书》“其行类君子邪？小人邪”句批“辩而肆”；“辞而辟之，廓如也”句批“汪洋浩荡，变化不测”；“其亦不仁”句注“一结有拦山截海之势”。《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注“序简古有法度”。《唐故相权公墓碑》“张举措必本于宽大”句注“十馀句不无生晦”。《论捕贼行赏表》“宗庙神灵，所共佑助”句注“□君之言，浅淡明白”。《顺宗实录三》批“太繁”。这些批点基本涵盖了韩文风格的主要特征。郑杰对韩文中的应酬文字亦直言不讳。如《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上批为“应酬文字”。《祭薛中丞文》则批“应酬文中极草率者，昔人谓代众作乃尔”。郑杰注语同时注意阐明文章精采感人之处或深味隽永主旨，发明独特真切的阅读感受。《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批“甘态。祖《史记·酈生传》。真翁婿哉”。传主王适有才识，怀抱远大而后自荐，与《史记》酈食其传情节相近。王适岳父上谷处士，姓高，自荐未用，发狂投江。王适与幕主一旦不合即载妻子遁入终南山，此行与岳父投江同为狂士之行，因注“真翁婿哉”。《柳子厚墓志铭》“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句注“含讽”。韩愈此句确为暗讽，韩愈与柳宗元为诗文之友，相知既深又实有不同政见。柳宗元与太子侍读王叔文亲密，而韩愈与王叔文较对立，是以韩愈有此讽。“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句注“此千古子厚，亦子厚千古定评”。韩愈认为柳宗元若非贬斥太久，困顿到极点，文学辞章就很难达到那样高的成就，此论点郑杰认为是

“千古定评”。

郑杰常通过对内容的解读说明行文用意,有助于对韩文意蕴深晦而结文精妙的认识,对于学韩文者大有助益。如《送杨支使序》“与之游者二人”句注“牵引崔李,文章便不寥寥”,指文章开篇从杨仪之宾客陇西李博、清河崔群说起,以引起杨仪之之贤。此笔法较开篇直叙杨仪之更为丰富生动。“有问湖南之宾客”句旁注“借问者发论”;“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句旁注“且结且承”;“及仪之之来也”句旁注“串作一家方有情”;“长于斯而媚”句旁注“破俗眼”。这些注皆是指明行文用意。《衢州徐偃王庙碑》批有“采世小说,奇藻动人”。指此文中采《穆天子传》故事。《穆天子传》为西晋时河南汲县出土竹简,主要记录周穆王西巡故事,内容往往荒诞奇妙,旧以此书为小说家言。“县龙丘有偃王遗庙”句批注“并引二说,极流动”。这类批点情况较复杂,既有对文章重点铺陈的方面进行解读,也有对描述时采用他处故事和言辞进行强调,说明对文章的作用。

第五,批注出后人韩文的引用、注解和继承。这一类批注广引宋代以后文献,对韩文在宋以后的传播和影响有所揭示。《大行皇太后挽歌词三首》的批注引元代陆友之注:“《研北志》云,韩文大行,注家引《昌邑王传》韦昭注,平声,此本今脱注不全者多。”《研北志》,即元陆友所撰《研北杂志》,原文为:“大行不反之词,见《汉书·昌邑王传》韦昭注。或者依《文选》注音,去声。所谓‘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此是自谥法。若大行皇帝者,乃新崩未有谥之称,当依韦注作平声,韩文《大行皇帝挽词》,注家正引韦注,是也。”^①卷十一《原人》郑注:“宋儒‘民胞物与’即此意。”“民胞物与”出自张载《西铭》。韩文中心意思是“是故圣人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正与“民胞物与”同理。郑杰指出宋代理学家张载与韩愈主张的继承性。《讳辩》对唐代避讳之习进行批评辩论,韩愈的主张受五代时刘昫《旧唐书》批评,认为有悖于孔孟之旨。郑杰注出《旧唐书》的批评且表明自己立场,批云:“《旧唐书》谓《讳辩》‘盪孔孟之旨’,决不敢从。”《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批注中,郑杰关注到欧阳修碑志文对韩文风格的接受继承:“体真横逸,欧公往往摹此。”今人全华凌认为“韩愈碑志文叙事的‘尚奇’、人物形象塑造的‘求奇’以及抒情恣肆澎湃,都与他敢于突破常规、勇于求新求奇、敢于超越的特立独行的性格是紧密相关的;而欧阳修碑志文法的独特性也是与作者的古淡、宽简性格与行事作风分不开的”^②。欧阳修文风格多条畅简淡,不同于韩文,此篇在韩文中并非“尚奇”之作,郑杰所指欧阳修摹韩文横逸之笔,实属精微之见。郑杰在《黄陵庙碑》“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故曰君”一句后注曰:“《文选》章句注,恨未引此。”

^①陆友:《研北杂志》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66册,第602页。

^②全华凌:《欧阳修对韩愈及其碑志文法的接受与超越》,《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文选》引王逸章句注《湘君》云：“尧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从而不反，道死于沅湘之中，因为湘夫人也。”又引五臣注之张铣注“君，湘水神也。”^①则娥皇为正妃之说，东汉王逸及唐代六臣均未道之，郑杰认为韩文此说为最先。外集卷六《顺宗实录一》之注引《旧唐书》对此文繁简不当的批评：“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旧唐书》云。”此意原出《旧唐书·韩愈传》：“时谓愈有史笔，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②《南海神庙碑》有绮丽奇壮的骈文，郑注引明代王世贞的批评，在“阖庙旋舳，祥飙送强，旗纛旄麾”句后注：“□□□而语奇气壮，□晋宋自别。弇州谓有相如之意，知言言之。”王世贞认为此文有司马相如赋体风格，郑注认为“知言”。此类批注关注到韩愈儒学思想以及文章风格在历代的反响，较有特色。

第六，郑杰的批注中还有对《韩愈文集》所见版本的记载，有对批注时间的说明，以及韩文中文体和特殊名词的辨析。卷一叶一天头注：“安信之家有韩文公家集第二、第十六二卷，茧纸正书，有文公亲改定字。”按，韩愈文集的宋刻本现存有以下七种：①宋刻本《昌黎先生文集》；②宋刻本《昌黎先生集》；③宋咸淳廖氏世綵堂刻本《昌黎先生集》；④宋刻本《新刊经进讲注昌黎先生文》；⑤宋刻本《音注韩文公集》；⑥宋庆元六年魏仲举家塾刻本《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⑦宋绍定六年临江军学刻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③。这些版本中，绍定与咸淳皆在朱熹卒后，其他宋刻本不知详细年份。庆元六年正是朱熹的卒年，魏仲举刻本有清代王昶、丁丙跋，现藏南京图书馆，但此书并无批校。若郑杰所言确实，曾有朱熹手定的韩文本子，就笔者目力所及，不见于现今所见任何著录。《潮州祭神文五首》末批：“此卷于舟荡洋，字比病中更不谨。时丁未七月望，赴太仓。”此丁未当为乾隆丁未，即乾隆五十二年。《送穷文》“主人使奴星结柳作车，缚草为船”句注曰：“奴星，一本作星星。唐人多此名奴。犹令倩盼名婢。”《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注：“卒葬曰铭。后世以散序曰志，以韵语曰铭，泥矣。”这一类批注不拘一事，虽零散，却有独特的价值。

从现存数百条注语来看，郑杰注释有数处错误，另外，对文集四十卷的后十卷、外集十卷、附录二卷注点稀少，确是未完成之作。而现存的这些批注仍能反映出郑杰的学术特点和倾向，即长于名物考证，无征不信，同时又娴于文学批评，见解独到。

【作者简介】张秀玉，女，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安徽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①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2012年，第617页。

②《旧唐书》卷一六〇，第4204页。

③翁连溪编校：《中国古籍善本总目·集部上》，线装书局，2005年，第1198-1202页。